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悖论

——兼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启示及教训

叶 娟 丽

(武汉大学 文科学报编辑部,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叶娟丽(1968-), 女, 湖北崇阳人, 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法学博士, 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摘 要] 行为主义政治学在 20 世纪中期的兴衰, 反映了政治学研究方法内在的矛盾性、特殊性和复杂性, 这集中体现为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之间的矛盾、研究目的与研究手段之间的矛盾、科学方法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两难关系。为此,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论, 必须正确处理好这几对矛盾关系。这种新的方法论, 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就其理论主张而言, 它既强调政治学研究的政治性, 又强调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 既能客观反映现实政治生活, 又能倡导政治生活的理想。

[关键词] 政治学; 科学方法; 政治价值; 行为主义政治学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4)05 \ | 0629-07

从理论的发展规律来看, 任何理论都有一个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行为主义政治学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迅速崛起, 是因其对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革命; 它发现了政治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的特殊矛盾, 其集中体现就是科学方法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悖论, 即一方面, 政治学作为科学, 要求对政治现象做客观的不带任何价值偏爱的研究; 同时, 受政治价值与意识形态的影响, 政治学研究又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现实政治的工具。因此, 行为主义政治学试图通过提倡实证方法和“价值中立”来解决这一矛盾。但事实上, 科学方法与意识形态的矛盾是政治学研究内在的悖论。行为主义政治学不仅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反而在实践中走向了惟实证研究的极端, 这正是它走向终结的原因。

一、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内在矛盾

(一) 政治学研究中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两难关系

政治学是以人的政治行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中必然包括能动的处于特定政治关系中的人, 人的能动性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政治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此外, 处于政治关系中的人, 其行为中有很多无意识的成分, 这是科学研究手段无论如何也不能加以处理的, 对人的政治行为进行纯自然科学式的研究根本不能解释那些无意识的行为后果。同时, 人又是理性的, “人类的行为通常以某种方式与他们的愿望相关。人是有目的的”^[1] (P. 23)。因此, 一个人在描述和总结自己的行为 and 态度时, 可能撒谎、出错或自欺欺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也许我们研究的对象过于软化, 以至无法用正式的科学手段来加以研究”^[2] (P. 194)。有的学者干脆反对用纯粹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 如威尔

逊就宣称,他“不喜欢政治科学这个词”,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对称性地将人类加以区分,你们不能毫无感觉地用科学的眼光来盯着他们”^[3](P.10)。在有阶级社会,人的行为还存在各不相同的内在动因,如利益动因、权力和权利动因、个人心理动因等;同时,也存在某些无法摆脱的外在制约条件,如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这样一些内外因素,会使处于政治关系中的人面对研究者时行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出现偏差,研究者所了解或者经验观察到的人类政治行为,不一定就是政治现象的真实一面。因此,难以在政治学研究中得出对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有效的规律。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有论述。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史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4](第 247 页)。政治学研究的复杂性在于透过偶然性,去发现人类政治行为中隐蔽着的规律,并“解释为什么人们有这样的政治行为,为什么政治过程和系统结果发挥了这样的功能”^[5](P.24),而不是那样的功能。而在此过程中,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之间是互动的,这种互动关系正是造成研究立体无法独立于研究对象、无法做到政治学研究“价值中立”的重要原因。行为主义政治学以“价值中立”和唯实证方法相标榜,既没有清醒认识政治学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之间这种两难关系,也没有科学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是试图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当做完全客观、中立的物质对象,其结果必然无法发现政治现象背后隐藏着的规律,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科学的政治学。

(二)政治学研究中研究手段与研究目的之间的两难关系

科学研究必须有目的,目的是终极性的东西,是整个科学研究的方向。那么,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不是就事论事地陈述现象,而是要解释和评价现象,是要“建立一种能够概括在科学探讨中涉及到的有关经常性事件或事物的行为的一般性法则;从而使我们能够把已知的关于事物的一些分散的知识集合起来;并做出对未知事物的可依赖的预测”^[6](第 28 页)。作为政治学,其目的不是如行为主义政治学向我们所展示的经验和事实,而是“要超越人们可以指望从直接经验中学得的那些东西”^[7](第 9 页)。因此,政治学研究必须有经验的事实为基础,但这不是研究的目的,其目的在经验事实之外。

科学研究除要有确定的目的之外,还必须有具体的方法或手段。目的是终极性的,而方法只是工具性的,“手段本身是由目的来说明的”^[8](第 164 页)。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手段与目的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把试验和测量当做科学研究的手段的话,那么,“试验只不过是向自然提出一个问题,测量就是把答案记载下来。然而在进行试验之前先要加以思考,也就是说要拟好向自然提出的问题,而从测量中得出一个结论之前,首先要解释它,也就是说要理解自然的答案”^[9](第 8 页),而这种解释和理解就是超出方法和手段之外的东西。政治学研究也是如此,方法只能是为目的服务的,“决不能以它们本身为目的。我们的目的毕竟不是卖弄自己手中的方程或公式,而是要发展实在的政治学理论。如果方程式对这一过程有帮助,那么我们就都有必要学习数学。如果这些方程只是我们为了显得莫测高深而用来装点门面的,那它们就是多余的东西!”^[6](第 511 页)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的失误,正是将研究手段和工具置于研究目的之上,将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发展到了极致,过于强调方法,而忽略了政治学研究的本来目的,从而走向了它的终结。

(三)政治学研究中科学方法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两难关系

政治学研究像任何科学研究一样,期望能够得出不带偏见和成见的科学结论;同时,政治学研究又不可能不受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意识形态必然是带有偏见的,必然是带有成见的,科学方法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政治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悖论,使得古今中外的政治学研究者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一旦走向极端,就会使政治学失去其本身的意义,要么沦为政治的工具,要么被束之高阁,成为象牙塔中繁琐的文字游戏,失去政治生机和活力。

从历史上来看,自古以来的政治学研究,莫不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目的,为特定的政治价值辩护,是政治学研究的特征之一。如亚里士多德极力为奴隶制度辩护;阿奎那力图证明神权高于政权;霍布斯主张绝对的君主专制政权;洛克强调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议会主权;等等。可见,政治学研究没有也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政治学研究又是一种科学研究,必然追求科学方法,而科学方法与意识形态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科学理论不包含价值判断,而意识形态则包括一个价值观体系;另一方面,科学理论基本上是靠已被科学检验和证实过的事实,意识形态则不仅原则上归纳了这些事实,而且大大超过这些事实”^[9](第9页)。科学方法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这种矛盾,正是行为主义政治学提出“非意识形态化”口号的根本原因。

既然科学研究从来就不能真正离开意识形态,我们在政治学研究中就必须做出价值判断和选择。正如行为主义政治学大师达尔所认为的,“对人类的研究与对自然界非人现象的研究有着内在的区别”^[8](第12页),不可能存在不加选择的事实;而事实一旦需要选择,就不可避免地会受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哲学的影响。可见,在政治学研究中,科学方法与意识形态都是必须追求的目标。一方面,完全的“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是说,“价值中立”不应该成为政治学研究追求的目标,相反,为了还政治以本来面目,为了客观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质,在特定条件下,我们强调政治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的“价值中立”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倡导“价值中立”和唯实证的研究方法,力图通过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以纠正政治学研究过程中的个人价值偏好,使政治学成为真正的科学。这既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科学理想,也是其方法论局限的根源。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的启示及教训

(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方法论的前提

行为主义政治学在20世纪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方法论的革新,是政治学研究创新的前提。就目前的中国政治学来说,首要课题就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方法论。针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现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政治学研究的政治性问题,一个是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论时不可回避的问题。

1. 关于政治学研究的政治性问题

所谓政治学研究的政治性问题,在这里是指政治学研究的目的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就与现实政治生活密切相关,或者说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与柏拉图同时代的孔子,对政治的思考首先是理想状态的。而且,他的政治理想是非常明确的,“克己复礼”,其目的就是要恢复周朝的旧有统治。尽管他是在倡导一种理想,但他理论的出发点是挽救现实的政治危机,这就使他的思想与现实政治生活密切相关。而由他开创的儒学,后来发展成为我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更是将为现实政治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这样一种思想,影响着中国历史几千年,“学而优则仕”,政治学理论的发展总是自觉地与现实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

进入近代以后,民族危机促使学者们对政治问题的思考首先就与救亡图存这一现实的政治目标结合在一起。从康有为、梁启超,到陈独秀、李大钊,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思想,还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富国强民。正是为救亡图存、富国强民,在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理论被先进知识分子带到了中国,这种政治学理论一开始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国的指导思想,而具有学科性质的中国最早的政治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与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

的。建国后,政治学研究基本上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到了文革这样一个特殊时期,马克思主义被完全教条主义化,政治学研究也完全意识形态化了。阶级斗争的理论被当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而政治被看成了纯粹的阶级斗争,政治学研究至此已经完全失去了其应有的学科地位。

而进入 80 年代以来,随着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恢复和重建,我国真正具有学科意义的政治学也得以建立和发展。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行为主义政治学传入我国,其倡导的“价值中立”论很快就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渴望从教条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学者。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很多关于村民自治、城市社区建设、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方面的研究,这样一些研究,主张剔除个人的成见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强调以事实和数据说话,而不以既有的政治结论或者政策为研究的基本前提,力图超出意识形态的约束,做纯粹的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科学研究。而与此相反,一直以来,也有部分学者的政治学研究致力于对政策进行解释,他们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国家已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研究资料局限于政府公开发布的红头文件,而研究的结果则是为既定政策做细节补充、背景说明或者资料介绍,其地位的确立完全随政策的变化而定。

在我国目前,这样两种倾向同时存在。有些政治学者力图摆脱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埋头于统计数据或者故纸堆,对现实政治不闻不问;而有些政治学者则将政治学研究当做对红头文件的解释,完全变成意识形态的翻版。这样两种情况,应该说都是非常有害的。所谓纯学术的政治研究,脱离现实的政治价值的束缚,历史已经证明,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可取的,离开了现实的政治生活,政治学研究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而将政治学研究完全庸俗化,变成红头文件的再版,也是非常有害的,这样的政治研究会失去自主性和客观性,最终会失去其应有的学科地位,而被实践抛弃。因此,就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来说,首先需要提倡政治学研究的政治性,在承认政治研究与特定意识形态相互关联的前提下,提倡政治研究应以服务于现实的政治生活为使命,着眼于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大力发展政治学的应用研究和政策研究。但是,在提倡政治学研究的政治性的同时,我们反对将政治学研究变成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学研究在着眼于现实的同时,必须高于现实,超越现实,并最终引导现实政治生活走入理想境地。

2. 关于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问题的

所谓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问题的,是指政治学研究的手段与方法是否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的问题。从传统上来说,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从来就注重抽象推演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近代以前一直都是中国学者思考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而研究的手段或者方式,就是依靠历史文献。进入近现代以后,西方人类学、社会学中的一些新方法开始进入中国,比如说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方法,就给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式和方法。但是,总体来说,在 80 年代以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抽象推理的方法、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中最常用的方法,即统计学的方法,还比较少见。

而进入 80 年代以后,受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各种实证的研究方法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在政治学领域,对政治文化、政治心理、政治参与、选民投票等问题的研究,开始成为政治学者经验研究的首要选择。在这样一些领域,一些统计学的方法、抽样调查的方法、个案分析的方法、个人访谈的方法被广泛运用,而这样一些研究,其内容绝大多数都停留于一些资料和数据,停留于个案分析,而忽视对这种个案的理论分析及对相关政治现象的规律总结,在研究手段日益科学化的同时,其研究逐渐失去理论意味。

可以说,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中,既有传统的以思辨为主的研究方法,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全盘接受行为主义政治学惟实证的研究方法。实证的方法在客观准确地描述政治现象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政治学研究如果仅限于实证分析,只重现象,不求本质;只重经验,而忽视人类的想象,那也是不够的。如目前政治学研究中大量运用的民意测验的方法,就是运用各种调查表格来了解人们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而并不关心这些态度或者观念形成的背景及其对政治生活的不同影响,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只重现象和数据而不求本质的方法。这种方法走向极端,就会导致新的形而上学。而就传统方法而言,其研究有欠客观和准确,而且,这种研究方法一旦与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价值等规范问题结合起来,就有

可能在研究中渗入个人的主观偏见或者成见,在描述客观事实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

因此,目前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在倡导政治性的同时还必须提倡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具体地说,就是在遵循科学研究普遍规律的前提下,对政治现象做系统的、客观的研究。关于历史和政治思想的每种形式,本质上取决于思想家及其集团的生活状况。政治学的任务是“将包裹着这一洞见的那层片面的政治外壳去掉”^[10](第127页),以发现政治生活的本质。政治学毕竟是一门独立的自主的科学,它与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不同,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即时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它既强调为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开方制药,更强调为分析和解决根本的社会政治问题提供思想方法、理论指导和理想倡导。因此,政治学研究要求反对狭隘的阶级斗争理论,客观地反映真实的政治生活,精确地描述现实的政治图景,遵守学术活动的固有规范,大力发展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方法论的原则

方法论的革命是政治学创新的前提,而方法论的活力来自于多元和开放,这正是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方法论时应该遵循的原则。

首先,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政治学方法论,应该是多元的,宽容的。

方法是由目的决定的,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受制于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而政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在实际运用中都是有限的,这就注定了政治学的方法论不可能是刻板的、单一的,而应该是多元的、宽容的、综合的、开放的,如果固守一种方法,则会走向极端,陷于僵化。行为主义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科学的,但它一旦走向极端,固守一种模式,也就注定了要走向失败。

其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方法论,应该是开放的,不断创新的。

从来就没有万古不变的政治生活,因此,也不应该有万古不变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永远都不存在最好的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科学方法主要是分析性的,……通过科学走向实在,就只能得到实在的几个不同方面,就只能得到用简单化了的线条绘成的图画,而不能得到实在自身”^[11](第2页)。自然科学的实证的方法对研究具体的现象是很好的工具,但在形成最后的抽象概念的时候,仍然需要哲学的方法。“科技知识并不是对生活世界唯一重要的知识形式。”^[12](第156页)虽然我们一直在追求最好的方法,而且我们也主张应该追求最好的方法,但所有的方法都是不断创新的。从科学发展史来看,方法论总是不断超越的,包括自我超越。如实证主义相对于思辨的自然哲学而言是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它是对自然哲学的反动,这在思辨方法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是革命性的。但是,科学研究的成就,人类对自然的迅速胜利,却反过来影响着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自然科学过分崇拜,并将自然科学研究的原则和方法论无限地推广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来,这就是19世纪以孔德为代表的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盲目仿效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做法,使得它迅速走向封闭,成为又一种形而上学体系,再次束缚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发展。这种独断的做法又引起方法论领域的新革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研究方法论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它是指导我们研究政治学的首要原则,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真理性决定的,也是由我国政治学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但即使如此,我们也认为,“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只能是局部的观点,因为历史的总体总是过于广泛,以致产生于它的任何个别的观点都不能把握它”^[10](第154页),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但也并不是我们在方法论方面的惟一选择。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实践活动具有客观实在性,因而实践是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惟一标准;同时,它强调世界的相互联系和不断发展,反对孤立、静止、片面地看待世界,主张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真理性的同时,也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强调理论的真理性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这样一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首先就使马克思主义本身成为了一个开放性的发展着的真理体系。

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思辨和实证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两种方法”,而是同一种方法的两个要素,它们有机地统一着,并在对矛盾事物的认识中辩证地发挥作用。马克思曾经强调,在思辨的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应体现出实证性,即根据实际占有的材料进行抽象,而非“无米之炊”,更非看相算卦。在实践中,马克思也非常强调科学的实证研究,如马克思主义一向所提倡的实事求是,就含有某种“价值中立”的意味。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来看,它并不一味地排斥其它的科学研究方法。他也主张通过大量的历史的或现实的材料来了解政治生活的发展过程和基本特征,同时也可以借用大量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甚至人类学的知识,来了解政治现象发展的轨迹。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中,他们都充分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如他们早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利用了大量的历史和现实资料,尤其是借用了大量的其它学科发展的资料和文献。

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实证方法,在马克思《资本论》这部伟大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自己也曾提到过。他说,“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例如,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你们猜猜看!——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13](第 109 页)。在此也可以看出,那些以“实证主义”自我标榜、并在原则上排斥思辨的人,当他们研究实际问题的时候,也意识到科学研究不能局限于分析既成的事实,也要不自觉地进行思辨。也正是“在与其资产阶级对手进行斗争时,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在历史事件和政治事件中,不可能有‘纯理论’。它看到,在每一种理论的背后,都隐伏着集团的观点。集团思维这种现象依照利益以及社会环境和生存环境表现出来,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称为意识形态”^[10](第 126 页)。正是因为认识到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和意识形态的不可克服,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思辨与实证,作为抽象思维过程的两个要素,是统一的,片面地强调其中之一,排斥另外一个要素,都必然在思维中造成重大缺陷和错误。在科学的、辩证的思维过程中,思辨和实证的相互排斥是不存在的,抽象思维必须探讨矛盾运动的全部内容,而且要由系统的思维环节有机地构成,即比较、分类、归纳、分析、综合、演绎、定义、论证等,而这些环节,都要以充实的现实材料为依据,并要保证每个环节的严谨、充实。“在马克思那里,根本没有思辨与实证的对立,他的思辨是实证性的,他的实证是思辨过程各环节的内容。”^[14](第 323 页)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并不是方法论发展的终结,它同样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政治生活的现实发展,要求对政治学的研究要注重其科学性,不否定将自然科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方法和手段应用于政治学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对 20 世纪政治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其中所运用的许多具体方法和手段对我们今天的政治学研究仍然有用,我们对其可以加以批判地使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运用,也存在走向僵化的可能。因此,我们在破除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迷信的同时,也必须反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过程中所形成的僵化观念。我们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不是坚持僵化的方法论,而是坚持开放的、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反对行为主义政治学,不是反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一切主张和方法,而是反对形而上学化了的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学方法论,这样一种方法论体系,就其基本原则而言,是多元的、开放的;就其理论主张而言,它既强调政治学研究的政治性,又强调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要求在政治学研究中,必须尽可能地使用准确的术语和定量的方法,以求客观、公正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来面目。这样,既使政治学不远离政治,能够紧紧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又能使政治学研究超越具体的政治生活,超越于目前的政治生活,而站在较高较远的角度来审视现实政治生活,总结政治生活的规律,制定政治生活的规则,倡导政治生活的理想,从而指导政治生活的具体操作,使政治生活朝着完善完美的方向发展。这是政治学的理想,也是政治学的责任。

[参 考 文 献]

- [1] Dyke, Vernon Van. Political Science: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of Press, 1960.
- [2] Kavanagh, Denni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Behavior[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83.
- [3] Wilson, Woodrow. The Law and the Fact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11, 5.
- [4]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5] Eulau, Heinz. The Behavioral Persuasion in Politic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3.
- [6] [美] 齐斯克. 政治学研究方法举隅[M]. 沈明明,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7] [美] 罗伯特·A. 达尔. 现代政治分析[M]. 王沪宁,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8] [法] 雅克·马利坦. 科学与智慧[M]. 尹令黎, 等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 [9] [法] 莫里斯·迪韦尔热. 政治社会学: 政治学要素[M]. 杨祖功,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 [10] [德] 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黎 鸣,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11] [英] W.C. 丹皮尔. 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M]. 李 珩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12] [德]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M]. 毛怡红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 [13]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4] 刘永佶. 辩证历史——从黑格尔 马克思 毛泽东的辩证思想与历史变革论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 吴友法)

Dilemma in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Research

YE Juan-li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YE Juan-li (1968-), fe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majoring in theories and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 Political Behavioralism's rise and decline in 20th century reflected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 particularity and complexity, which centralized in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research main body, conflict between the research aim and research means, dilemma between scientific methods and ideology or political value. Therefore, we must deal with these contradiction relations in correct attitude to construct a new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research. This new methodology should be multi-dimension and open. As for its viewpoint, it should not only stress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in political research, but also stress its scientific character. More important, it can not only reflect realistic political life impersonally, but also spark plug an ideal of political life.

Key words: political science; scientific methods; political value; Political Behavioralism